

新旧交替的东亚格局

陆忠伟 著



时事出版社

新旧交替的东亚格局

陆忠伟 著

时 事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153号

新旧交替的东亚格局

法忠伟 著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邮政编码：100081

北京怀柔中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25 字数：216千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80009-201-1/D·87 定价：6.9元

前　　言

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及波黑战乱后，国际形势出现“西乱东稳”的态势，亚太地区在全球政经格局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其形势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该地区也面临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在国际政治领域，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日本的“大国走向”问题、亚太各大国的协商与安全机制的建立问题等等，致使地区的安全更趋复杂、迷离。在经济合作领域，面对已形成的北美、西欧两大经济圈，亚太地区何去何从，是在原有以实质性交流为基础的“局部经济全圈”的基础上，深化内部经贸合作，拓宽市场，保持美亚两大市场的一体化；还是高筑贸易壁垒，另立超越国家的“经济圈”，与美欧两大贸易集团分庭抗礼，已成为关乎世界经济气候的晴雨表。总之，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走向势将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要预测面向21世纪的亚太形势，有必要对80年代以来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轨迹作一全面或细致的回顾，以便人们对各种事物的有机联系、来龙去脉、正负影响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本书着眼于亚太政治、经济格局的交替，按前瞻与后顾两个层次，分东亚政治新格局、亚太经济的崛起、日本的国家走向与中日关系、局部经济圈的发展，及东亚经济模式等若干章节，归纳并分析了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情况。由于文章的时间跨度较大，且逢近几年形势瞬息万变，从今天的角度看，回顾部分中有些观点，目前仍能成立，对亚太问题研究能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本书作者陆忠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有15年之久，现任现代国

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他曾先后在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当客座研究员，并多次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入所初期，他主要研究日本经济，后研究范围逐渐拓宽，现已涉及日本政治、经济、外交，亚太经济与安全，研究成果丰硕且有一定深度。我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推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与国内外同仁的学术交流，进一步活跃日本与亚太问题的研究。

陆忠伟曾主持过的东亚研究室约有研究人员20多名，以年轻学者居多数，主要研究日本、朝鲜半岛问题，若按地理概念严格划分，亦可称之为“东北亚研究室”。目前，该室部分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亚太安全问题，准备成书付梓，我期待着这本专著的问世。最后要顺带说明一下，本书的所有观点都是作者的研究心得，不代表他所在的研究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徐 淡
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

1993.4

目 录

第一章	东北亚安全形势	(1)
	东北亚各国的外交轨迹与走向	(1)
	东北亚的安全形势与前景	(9)
	中韩建交与东北亚形势	(16)
第二章	日本的走向与中日关系	(21)
	日本的世界地位与国家走向	(21)
	自民党继续执掌权柄的原因	(36)
	“海部外交”及其走向	(44)
	宫泽的国策与外交	(51)
	中日关系新起点及趋向	(57)
	国际格局变动中的中日关系	(65)
	亚洲安全中的中日关系	(72)
	亚太经济新格局与中日关系	(80)
	中日贸易气候	(86)
第三章	亚太经济的回顾与展望	(94)
	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崛起	(94)
	亚太经济与我国的机遇和挑战	(102)
	西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趋势	(111)
	90年代亚太经济合作深化方向	(118)
	90年代亚太经济合作前景与新秩序	(124)
	90年代日本资本输出态势及影响	(133)
	亚洲“四小”经济发展新战略	(140)
	东北亚经济合作战略与前景	(145)

	东盟经济高度化及东亚经济合作	(152)
	80年代以来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	(163)
	日本“金融开国”初探	(179)
	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	(188)
第四章	亚太“局部经济圈”的兴起	(205)
	亚太经济的交流系统与合作组织	(205)
	“亚太经济圈”及对我国的影响	(211)
	“东亚经济集团”构想	(218)
	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前景	(226)
	“华南经济圈”的现状与展望	(239)
第五章	东亚经济发展的成功之路	(246)
	值得借鉴的“东亚经济模式”	(246)
	日本“经济模式”特色	(251)
	日本如何治理“狂乱物价”	(257)

第一章 东北亚安全形势

东北亚各国的外交轨迹与走向

一、东北亚国家外交半径空前扩大

自美苏对抗结束、覆盖东北亚的冷战坚冰随之消融以来，该地区的政治态势就一直在变，或者说，处于一种“流动”状态。一股潮流是，长期反目的国家化敌为友，握手言和；另一股潮流是，“外交引起外交”的战略调整。这一系列重大的外交举措——绝大多数为战后首次、两国关系史上首次，及地区国际关系史上首次——显示出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国家外交自主性的增强及外交半径的拓宽，堪称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新纪元”。

1992年8月24日的中韩关系正常化是东北亚政治格局变动的触媒。这两个具有灿烂亚洲文明的国家——一个以经济现代化为中长期国家目标，一个正奋力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和睦相处，是东北亚政治舞台上继中苏决裂、中日建交、苏韩修好、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之后，又一幕国际关系的重大调整；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漫长历史阶段的结束。继中韩两国首脑北京会晤之后，日本天皇陛下访问了中国、韩国总统对日进行了“闪电式”访问、俄罗斯总统越日本国门而不入，出访韩国，再访中国，这一连串的外交活动，给冷战时代东北亚地区“六国三对立”美日韩与苏中朝的战略格局打上了休止符，客观上加速了东北亚政治新格局的形成，尽管整个态势并未最后固定下来。

尽管东北亚政治舞台上的外交活动令人眼花缭乱，但细加分析，亦能从时间顺序、外交思想、登台主角等角度，理出一个进

展程式，进而能增强对未来展望的可信性。

首先，前苏联“新思维”外交的出台、韩国“北方外交”的施展、中国对周边“和平外交”的推行，导致东北亚国际关系出现格局性变动：1990年9月苏韩建交，同年12月卢泰愚访问莫斯科，翌年4月戈氏顺访韩国；1992年春，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同年8月中韩建交。这前后呼应的外交活动，导致“六国三对立”的对抗框架彻底崩溃，及半岛局势的空前稳定。对韩国来说，这是其“北方外交”的“毕业典礼”，有益于其提高国家安全系数及拓展中、俄市场。对俄罗斯来说，其因此拓宽了在朝鲜半岛的外交半径，并跻身充满活力的亚太经济圈。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考虑，是谋求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与韩建交，即体现了这一原则。由于中国、俄罗斯与韩国对立长久，且曾兵戎相见，所以，事态变化的历史性，在某种程度上给有关国家造成了心理不平衡。

其次，韩日首脑的“闪电式”会谈，及与此相关的美国大选揭晓和韩国大选的开场，以确认美、日、韩外交、安全基轴的形式，冲淡了中、俄、韩蜜月的色彩，在某种程度上，是日、韩对“北方外交”的调整或反弹。如日韩双方在对美关系上，强调“美国的存在对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至关重要”，在克林顿执政后，“要进一步加强日美韩三国在这一地区的合作关系”。在日韩关系上，日本认为“韩国是日本在亚洲最近的伙伴之一。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离不开双边协商”。在对华关系上，双方确认，“继续推进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接纳中国为国际社会富有建设性的成员”。

综上所述，日韩的首脑会晤，除有熨平“北方外交”的心理失衡外，亦将“布什之后”、“卢泰愚之后”纳入了外交射程。

再次，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出访韩国，正式拉开了“东方外交”的帷幕。叶称俄的外交应该遵循俄罗斯古老的徽章精神，

“同时看着东方和西方”。不言而喻，这是对向美欧倾斜的“西方外交”的修正。虽然不能因此而断言俄外交重心的“脱欧”、“入亚”，但其目的则是很明显的。短期目的在于获取经援，推动改革；中期以加入亚太经济合作圈为目标，长期目标则想巩固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与影响，成为名副其实的欧亚大国。俄亚太外交的日程安排是韩、中、印，新形势下的俄韩、俄中、俄印关系确有发展的必要和可能，而与这三个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国家的交往，又显现出俄罗斯外交的“脱意识形态”化，这种有别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的“国家利益至上外交”对东亚政治格局将产生影响。

二、东北亚大国关系的新探索

从上述中、韩、日、俄的外交动向及外交的连续性看，东亚西太平洋地区有一些有利于和平稳定的因素在出现。亚洲大陆12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亚洲数一数二的工业发达国家——日本、韩国，以及资源丰富、横跨欧亚两大洲的俄罗斯彼此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本身，就会成为巨大的和平稳定因素，这种不同制度国家的和睦相处，在国际新秩序的历史转折之际，更具有重大的意义。

东亚各国关系的发展，可涉及这些国家地理的、传统的、政治与经济等原因。中韩关系正常化的前景、中日关系发展的进展程式、俄韩关系升温的连锁反应，以及中俄关系的向新方向发展等等，这些国家在新形势下双边关系的发展，及其对亚洲“战略格局”与“力量均衡”将产生什么影响，是目前人们尤为关心的问题。

尽管当代东北亚的政治形势与格局和旧时代不能同日而语，但仍然出现了一些按照旧时代政治逻辑推理而产生的疑虑和担心。有些人常常议论中韩俄外交关系的改善，有朝所谓“三国同盟”发展的趋向，因而刺激了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它们借19世纪

末该地区发生的两场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与俄日战争——暗示目前东北亚正在重演100年前的历史。按照冷战时代的政治逻辑，外交政策的调整，国际关系的变动，及地区形势的变化，都是远交近攻、合纵连衡等外交权术的产物，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和睦相处是不可能的。这些观点与提法，不能不说留有“冷战”的深深烙印。

冷战体系（六国三对立）虽已崩溃，但冷战的惰性尤在，这是当前东北亚形势的一个特点。换言之，若对冷战意识不加以彻底肃清，任凭不健康思潮和行动的发展，新型国际关系就难以建立。从目前态势看，东亚、西太平洋地区一些有利于和平稳定的积极因素在出现、在发展，重要的是一些影响国家关系正常发展的思维障碍尚待排除。

首先，中韩关系中的“日本问题”，即所谓“中韩联手，牵制日本”，中韩建交是以日本为“假想敌”而作的战略设计。这种论调在韩国和日本的舆论界、思想界并不罕见。在韩国舆论界，它是与历史上的对日“警戒论”、“牵制论”纠缠在一起的，而这种看法确也流行一时。事实上，展望90年代，中、日、韩三国的战略利益具有客观上的一致性，它们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这三个国家的和睦相处，及良性互动关系本身就构成巨大的和平稳定因素，中、日、韩三国都不会、也不应不顾全这一大局。特别是中国有关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在于不搞战略合作，并向所有国家开放，所以不会对此采取权宜之计。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错误的判断将对政策造成消极影响。

其次，中日关系中的“美国问题”，或者说日美关系中的“中国问题”。这主要指中日关系的发展深度受到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制约，美中关系不好，殃及日中关系。面向21世纪的中日关系的坐标轴是如何在国际新秩序与亚太新秩序中给两国关系定位。它涉及两国政治家的体制观、价值观和人权观，关键在于

能否超越意识形态界限，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在冷战年代，中日两国已就此取得了共识，并已付诸实践。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对日政策的指导思想经得起历史考验。从另一角度看，中日和睦相处亦是推动国际新秩序向健康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日本为发展两国关系采取了积极行动，但对来自西方的“以制划线”的压力，不理直气壮，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受了美中摩擦的影响。

再次，中俄关系中的“日美问题”，这也是人们常说的中俄是否会恢复50年代“铁板一块”的战略同盟关系。中俄关系的新发展，有它本身的基础与成熟条件。在政治方面，中国外交以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思想；俄罗斯亦认为“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约束双方关系的发展”（俄总统叶利钦语）。从经济领域说，中国改革开放力度与层面的加大及拓宽，俄罗斯对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客观上给这两个邻国提供了许多经济合作机会。但这种关系的发展，并不是要搞拉一打一的“战略游戏”及排斥第三者的“北京—莫斯科轴心”。中国外长钱其琛在出访俄罗斯后指出，中俄这种正常的国家关系不是对抗性的，也不是结盟的，而是一种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重新回到结盟，不需要也不可能。这种正常的国际关系于该地区的稳定有利。所以，中俄关系的前景，不会出现一些人担心的过去那种“中苏—美日”的抗衡格局，过于悲观倒会影响地区的稳定。

三、“亚安体系”的着眼点

现阶段的东亚与西太平洋局势，脱离了紧张对立的状态。美俄中日的非对抗性相处，堪称历史之空前。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北亚地区已经进入一个政治相对稳定的新时期。东北亚有关各国应积极利用外交半径因此而拓宽的良机，致力于建立良性互动的国际关系，防止“六国三对立”历史的重演，构筑东北亚地区的

新国际秩序。彻底根除美中关系恶化时殃及日中关系，中俄关系改善引起美日神经紧张，韩中正常交往又导致别国不安的排他的恶性循环。

另方面，各方面也注意到了东北亚地区尚存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如日俄关系因领土问题而结下难解的疙瘩；日朝、美朝关系悬而未决；朝鲜半岛北南双方会谈时有搁浅；日美关系在“后冷战”时代的重新定位；美国提高对台军售档次、违背中美“三个公报”原则等等，反映出该地区新秩序的建设与完善，还要经过一个漫长、复杂、艰巨的路程。

面对上述局势，一些国家建议效仿“全欧安保会议”(CSCE)形式，构筑东北亚多边安全体制。如韩国提议召开“东北亚会议”，召集朝鲜半岛周边的六国，讨论半岛局势的稳定；日本一些研究机构亦曾提出过此类设想，拟建立一个“类似于伞”的安全框架；俄罗斯总统在韩国国会的演说中亦建议“建立整个亚太地区和次地区的多边谈判机制”，就“亚洲东北部地区的安全问题进行磋商”，并为此“建立危机调解系统”、“建立地区战略研究中心”等等，可以说其中不乏合理的内核。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欧安会”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经济与地理条件，在冷战时代，欧洲两军对垒、敌我分明，因此，其安全机制之形成，有一定的基础。相比之下，东北亚的情况就相对复杂一些。除了人们经常说的经济水平差异、文化渊源不一、历史遗留纠纷、冷战后遗症等因素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有关国家建立地区安全机制的基本认识还是有差距的。所以，与其匆忙建立一个名不副实的机构，不如先就地区的政治、安全问题取得共识，理顺尚未通畅的双边关系，解开紧紧纠缠的死结，使整个局势活起来。

要使东北亚政治、安全局势进一步活跃与稳定，需要各国主政者拿出新的眼光和姿态，大家视野再开阔一些、手脚再伸展一

点。应该说，80年代以来，中国高度独立自主、坚持和平共处；韩国对俄、中两国的修好，以及俄罗斯新近推出的“亚太外交”均为外交大略。东北亚局势稳定与新秩序形成的关键，是要坚持不搞抗衡、互相信任、发展合作、多元共存。这是面向21世纪东北亚国家外交路线的主航道，偏离这一航线，势将导致地区局势的不稳。具体地说，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应倡导和平、对话，积极致力于对话系统的建设。各有关国家不仅要善于自处，亦要善于处人，对热点争端应两边劝和。第二，在政治、安全、经济等各领域，应倡导多元共存，建立不同社会体制、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和睦相处气候，推动地区新秩序向健康方向发展。第三，深化区域经济合作，通过渤海、黄海、日本海等局部经济圈的合作，使整个东北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地区局势稳定的坚实基础。

四、各国外交走向

从如上东北亚各国的外交行动轨迹，当前存在的问题及联系应该遵循的航线看，东北亚主要国家今后的外交将呈现如下走势。当然这是与整个国际形势大背景，及各国家战略有着密切关系的。

韩国外交——“北方外交”已经奏效，为消除外交上的顾“北”失“南”之感，不时还会增大对美、日的外交频率，建立与美、日、俄、中的四边平衡关系。一方面，韩为外交态势总体平衡稳定及提高国家安全系数，势将强调韩美关系在外交中的“基轴”地位，及韩日关系作为安全支柱的作用，这是韩国对外关系的半边天。另方面，则逐步加强对俄、中两国的外交力度，提升韩俄、韩中关系，使之不亚于韩与美日的关系，从而获得更大的外交活动半径。

俄罗斯外交——“东方外交”拉开帷幕，表面上虽称“东西并

重”，但实质是“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替代了理想主义，如果说在外交总体态势中，俄罗斯是以“东方外交”来平衡“西方外交”。那么俄“东方外交”走势就有两大任务：一方面，为维护俄在亚太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势将继续致力于增进对韩、印、中的关系；另方面，则要修补俄朝关系，及解开俄日关系的死扣。其主要动向之一，即要看叶利钦总统是否应邀及出席东京的七国首脑会议，进而以此为契机，使两国关系升温。

日本外交——“大国外交”加大力度，为从国际政治的“观众席”登上“大舞台”，日将发动一场“静悄悄的外交革命”，给外交注入“政治”新内涵：与东北亚有关国家勾销历史旧帐、倡导安全对话、构筑安全体系、密切政治合作、扩大“国际贡献”等等，最终使日与东北亚各国建立类似欧共体内德国与法国的关系。从双边关系看，日仍将把日美关系视为基轴；将日中关系视为支柱。对陷入僵局的日俄关系，日将坚持“一慢、二看、三通过”的作法，即大规模经援放慢，看俄国内政局与经改步伐及领土问题是否松动，在如上问题有所突破后，才与俄罗斯缔结和约，提升双边关系。

中国外交——“和平外交”范围拓宽，一方面，中国将一如继往地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另方面，中国将积极倡导及推动多元共存新秩序的形成。在对美关系方面，中国将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同克林顿新政府发展合作，减少双边关系中的麻烦，理智地探讨现存问题，进而使双边关系得到改善。中日关系上，中日经贸关系的跃进，增进了两国关系的基础，鉴于日本在中国对外政策中重要的位置，及两国关系对东北亚局势稳定的举足轻重，中国将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使之再上一个台阶。新形势下的中俄、中韩关系也将有较大发展潜力。

东北亚的安全形势与前景

一、东北亚战略格局的新变动

冷战的结束，给东北亚地区吹进了缓和之风。冷战时代所形成的“六国三对立”的格局落下了帷幕；被视为冷战“活化石”的朝鲜半岛、柬埔寨等区域争端“热点”也渐趋平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战后”。对东北亚形势的上述发展，有人称之为冷战框架的崩塌过程，其观察事态的着眼点是旧秩序的“破”。有人则置重点于新秩序的“立”，认为东北亚的战略态势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而上述不同观点的背后，则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即该地区的战略态势或政治地壳一直在变，形象地说，处于一种“流动状态”。

最近，东北亚战略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动。其主要触媒有三：

(1) 中韩建交。这是东北亚战略舞台上，继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俄韩建交后的又一次国际关系的重大调整；(2)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推迟访日。这是俄日关系乍暖还寒的表现，俄内部因素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日俄关系之发展受制于传统的地缘和海权思想，及纠缠不清的领土问题亦显而易见；(3) 美国对台出售F16战斗机。尽管美国人以布什竞选需要为托辞，并将此举归咎于中国大陆正常的国防建设。但有两点是很明显的：第一，美国违反了作为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两个公报”的精神；第二，使构成东亚稳定的中美关系出现波折，及孕育着该地区竞相扩军的危险。

与上述形势相呼应，各国在东亚的舞台上，将推出一场眼花缭乱的外交攻势。从时间顺序上看，首先，中韩两国元首互访。这是朝鲜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尽管两国在冷战的特定历史背景

下，曾有过一段艰难与充满恩怨的历程，而今握手言和，意味着一个漫长时代的结束。其次，日本天皇和皇后陛下访问中国。这是战后日本国家元首首次对中国的访问。一方面，这是健康发展20年的中日关系的“画龙点睛”或“锦上添花”之笔；另方面，亦将为两国中、长期的国家关系奠基。再次，俄国总统叶利钦出访韩、中两国。这是前苏联解体后，俄国家元首对亚洲国家的首次出访，此举意味着俄对亚外交份量的加大及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之决策的形成。综上所述，这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将使东亚的国际关系格局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尽管整个态势还未最后固定下来。

二、“后冷战”时代的战略格局程式

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国际关系向何方发展，该地区如何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东北亚将形成何种“战略态势”等等，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从各国的研究机构或政府智囊及专栏作家的描述看，该地区战略格局的进展将出现如下几种程式：

第一，“亚洲两极化时代的开幕”。即认为中韩建交将导致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架构与力量均势的巨大变化，由于俄国在东亚的影响急剧削弱，以及美国军事力量的收缩，中国的政治力量与日本的经济力量将在亚洲迎头相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历史将再次重演。即与10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一样，中日两国在东北亚的角逐势将激化。

第二，“纵横捭阖”格局的形成。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在“后冷战”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小型权力争夺”将替代冷战时期非“东”即“西”的战略对峙。即大国之间或大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围绕各自国家利益将展开频繁的“合纵连横”外交。基于这一推理，有一种观点认为，中韩建交在政治、经济、外交上都得